胡乔木晚年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思考

鲁书月¹, 张翼²

(1. 邯郸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5; 2. 北京华清飞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600)

[摘要] 胡乔木晚年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实现党对文学艺术工作正确科学的领导有过深入、系统地思考。他认为, 新时期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 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 要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 理清文艺与政治、文学的党性和文学的倾向性以及党的领导与文艺事业的关系, 认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上, 体现在服务和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关键词] 胡乔木晚年; 党正确领导; 文艺工作; 思考

doi: 10. 3969/j. issn. 1673-9477. 2021. 02. 001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1)02-001-05

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特别是如何实现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正确科学的领导,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且长期以来在文艺界、学术界又存有不同看法的重大问题。“文革”结束后, 胡乔木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 在任何时候, 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都必须高高举起, 在任何时候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都不能削弱;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 体现在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上, 体现在服务和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为了实现党对文艺工作正确科学的领导, 一定要理清党与文学艺术事业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党性与文学的倾向性等。他的思考, 尽管当时是力图实现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在纠“左”中出现的另一种倾向, 但对今天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推动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新时期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文学艺术领域与其它各条战线一样, 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正本清源, 拨乱反正, 由此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可有少数人却认为, 既然要解放思想, 再提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无的放矢; 既然要实行双百方针, 那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不应该再强调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 还有的人把其作品看作纯粹是个人的事, 与社会政治没有关系, 可以不顾及社会效果; 也有的人在创作活动中一味模仿西方“那些庸俗的、腐朽的东西, 或者追逐一部分群众的落后的低级的趣味”^[1]。对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倾向, 少数领导干部不敢站出来进行批评, 甚至也不能批评, 一批评就有人扣上“左”的帽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 作为我党思想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的胡乔木认为: 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 对“文革”左倾错误要拨乱反正, 对纠左中出现的右的错误也决不能忽视, 不仅不能忽视, 而且“必须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2]。

关于“无为而治”。1982年12月21日, 胡乔木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在与部分作家座谈时, 有人提出党要“无为而治”, 不要事事都管。胡乔木听后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 “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 完全的‘无为而治’, 我想恐怕是不能实现的。”当然, “领导方面, 不要大小事情都管”。现实生活中, 党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方面, 他认为实际上存在四种情况: “无为而治、有为而治、无为而不治、有为而不治。这四种情况, 都是有根据的, 都会有相当的事实。‘有为’也不等于就能‘治’。如果有‘为’而反而不‘治’, 那么这种‘为’就确实不要有。假如‘无为’而‘不治’, 那么, 这个‘无为’也不成。比如说, 现在作家的生活条件、出版发

[投稿日期] 2021-03-26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HB17YS004)

[作者简介] 鲁书月(1958-), 女, 河北曲周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和胡乔木。

行方面的问题,正说明从粉碎‘四人帮’后到现在五年当中,在这方面正确的‘为’太少。”所以他说,用“领导‘不要横加干涉’”来表示这方面的意思可能更准确。胡乔木认为:“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都要干预,这种方法是应该改变的。”^[3]但是,不要横加干涉并不是听之任之,不是不要正确的合理的批评,不是不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对歪曲地反映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对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作品,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胡乔木强调:“共产党员可以宽容一切,但对于反共的东西不能宽容。”^[4]否则,“就是放弃党的领导”^[5]。

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胡乔木认为: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也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界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衡量对文学艺术领导正确与否的标准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看文学艺术的路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而是文学艺术界是不是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胡乔木认为:路宽跟窄,纯粹是个数量上的形容词。我们当然主张文学艺术之路要越走越宽,但也不是越宽越好,宽得没有边。宽容要有标准。“在拥护四项原则(至少是不反对)的范围内,我们应该而且可以说必须宽容。……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我们的文学刊物上,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能宽容的”^[6]。

胡乔木还认为,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但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对在创新的名义下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在创新的名义下提倡一种脱离一切内容的艺术,我们也要反对。艺术是有社会功能的。假如我们的文学艺术丢弃了社会功能,不要社会内容,抛弃了社会利益,这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相容的。

不能把“双百”方针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胡乔木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但它不是唯一的方针。^[7]我们党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方针,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等。贯彻“双百”方针,就要纠正错误,批评落后,弘扬真、善、美,抛弃假、恶、丑。学术上民主讨论,艺术上自由竞赛,由此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前进。我们不能把这个方针当作党的思想工作的唯一的方针并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

什么就写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8]。

胡乔木对“无为而治”辩证关系的深刻阐释、对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的全面解读以及他关于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上加强领导的思考,对我们今天如何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提供了认识的启迪。

二、理清文艺与政治、文学的党性与倾向性以及党的领导与党和文艺事业的关系

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特别需要改进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主要是使党正确科学地领导。要做到这一点,胡乔木认为,有必要理清文艺与政治、文学的倾向性和文学的党性以及党与文艺事业的关系等问题,把这些关系理清了,就会为党的科学领导奠定基础。

首先,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乔木认为,对共产党人而言,政治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人民的利益,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他说,这两个口号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不是截然的不同,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更清晰、直接地表达了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只有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才是衡量政治正确性的标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对“文革”结束后胡乔木极力主张的经党中央同意的新的二为方针的充分肯定。

其次,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不能误解为整个文艺事业就是属于党的。胡乔木说:文学艺术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方面的许多事情,与其他工作是不一样的。单靠党的直接指挥,单靠党的组织的努力,没有党和作家艺术家的真诚合作是不能够完成的。所以,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许多与文艺事业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党就没有必要去干预。我们不能把文学艺术说成是我们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这就像我们党要对整个国民教育进行领导,要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领导,但不能说整个国民教育是党的教育,整个

国民经济是党的经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是党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的事业)^[9]。

再次,关于文学的党性和文学的倾向性。胡乔木认为:文学的党性和作为共产党员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党性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共产党员文学家、艺术家首先是共产党员,必须要有坚强的党性。他们同任何共产党员一样,必须坚持党的政治立场,在政治上同党保持一致,遵守党的章程和决议,服从党的组织和纪律。而文学的党性,是个特定的概念,它同文学的倾向性是一个性质,主要是指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所表现的阶级立场,一般文学作品并不是普遍具有,所以,文学的党性是不可以随便使用和广泛使用的。

胡乔木强调:对党员文学家,当然也希望所有革命的文学家,党要求在其作品中要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使其作品起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我们党对于某些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健康、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腐朽思想政治影响,不能熟视无睹,任其腐蚀人民,而要根据情况,进行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批评和教育,以克服这些倾向和影响。这是今天党对于文学的党性的正反两方面的要求。但党对党员作家的有倾向性的文艺作品要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要求,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如果把对党员作家的有倾向性作品的要求,扩展到对所有作品的要求,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的文学观就太狭窄了。所以,在今天,我们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那些政治倾向性不明显或没有政治倾向性,但其文学作品合乎美学标准,这样的作品要允许它存在,允许其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倾向性,“要通过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本身的规律,通过严格遵循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来表现,而不应该违背生活,违背艺术的规律,从外部加进来,硬塞给读者。”^[10]

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文艺事业的关系,正确认识文学的党性与作为共产党员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党性的不同,这是我党实现正确科学领导的认识前提。

三、党如何正确科学地领导文学艺术工作

要注意党对文学艺术工作方法,要在科学和艺术允许的范围里领导,不能“大小事情都管”,更“不要横加干涉;^[11]要尊重作家的权力;要开展正确的批评,并营造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环境。党的科学正确的领导,必然会充分调动作家的积极性,

从而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

首先,党在领导文学艺术时,不要大小事情都管,特别是不要横加干涉^[12]。胡乔木认为,党一定要在科学和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发挥它的作用。超出这个范围,粗暴地任意地主观地去干预他所不应该干预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13]”。因为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都不是粗暴干涉得来的,粗暴干涉只能“造成了许多作品和作家的各种不幸。^[14]”科学和文化就好似一所花园,领导的责任就是要负责灌溉、育种、除草等等。“如果他不去做这些工作,而是去践踏这所花园,这样的人要受到警察的干涉。”^[15]

其次,要尊重作家的权利。胡乔木说:一个作家他要进行写作,不能没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也可以说是哲学。那么这个哲学,我们虽然有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基本的哲学,但是,作家在对待他所写得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展开他写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个人的哲学,这个作品就写不下去,写不成。那么,某一位领导同志不能把他自己的哲学,来取代、来替换这个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所形成的见解,他对生活的意见。否则,这就很可能造成有为而不治,有为而乱治。^[16]作为一个领导,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正确的使用会得到积极的效果,反之,就会产生消极效果。所以,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在使用这个权利时需要十分小心。胡乔木说,领导在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也就是服务。“在很大范围里面,党对于文学艺术或科学、教育的领导,是同党对文学艺术,或者科学、或者教育的服务不可分的。”^[17]如果有的同志,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领导,而不是服务,如果说他是服务就委屈了,那么,这样的同志就不能够跟党领导的性质相协调。

再次,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或思想斗争是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重要表现,流水不腐,死水必腐。只有经常性地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使文学艺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进而促进其长期繁荣和发展。胡乔木认为,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或思想斗争,是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重要表现,也是党的领导的责任。那么,如何进行正确的批评?

其一,他认为批评中要注意两种倾向的发生。一种是对错误的东西不仅不敢批评而且姑息纵容,一种是“打棍子”、“扣帽子”简单粗暴。胡乔木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正确的批评。对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既不能不敢

批评甚至姑息,也不能简单粗暴甚至打棍子扣帽子,只有在实际操作中避免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产生,才能开展正确的批评。

其次,他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批评的共同基础。在怎样开展正确的批评的问题上,胡乔木从批评的目的到批评的方法,都作了重要的论述。他认为:领域不同、问题不同,对其批评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但不管什么领域,正确的批评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都必须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正确^[18]。

其三,他强调正确的批评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对需要批评的对象,需要批评的人和事,或观点,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批评要既入理,又入情。“入理是说切合事理,充分说理,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入情是说保持同志态度,准确理解和分析被批评者的心理状态,动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19]

胡乔木倡导的“入理入情”的批评方法,既不同于那种敷衍了事、不痛不痒批评,也不同于“文革”中长期存在的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的批评。他提倡的这种批评,更容易让大家接受,更能收到实际效果。其四,要营造健康的批评空气。胡乔木认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是繁荣的,但文学批评却远没有达到繁荣。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的批评、评论或辩论的风气,由此推动文艺批评的繁荣。胡乔木认为:批评者不能打棍子扣帽子,不能简单粗暴,同时,作家也要对评论家和批评家以更多的理解,不要责备求全,更不要疾言厉色。因为他们二者是平等的,目标是一致的。评论家和批评家也是在帮助读者理解、鉴赏和评价作品,他们同作家一起研究创作的经验,探索艺术和艺术所表现的生活中的得失是非,试图同作家一起寻求如何把作品写得更好、更适合于社会需要。批评家写出一篇评论跟作者写出一些作品一样经历辛勤的劳动。只要他们不是粗暴的,那么他们建设性的劳动都是应该欢迎的。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批评家,双方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这样就能共同营造良好的健康的批评氛围。批评的健康氛围营造起来了,才能迎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加强党的领导与改进党的领导,是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按照科学艺术的规律去领导,从而做到科学正确领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使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乔木60多岁,已进入人生的晚年。但他老当益壮,精神焕发。围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这个主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思考。他的思考,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工作的深刻了解,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充分的信任以及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今天,重新梳理这些思考,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科学的领导,发展和繁荣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 [1]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64.
- [2]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49.
- [3]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35-236.
- [4]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66.
- [5]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59.
- [6]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58.
- [7]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72.
- [8]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72.
- [9]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24-225.
- [10]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36.
- [11]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36.
- [12]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36.
- [13]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1-202.
- [14]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65.
- [15]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202.
- [16] 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5年:236.

民出版社,2015年:172.

[17]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237.

[19]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87.

[18]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M].北京:人

[责任编辑 王云江]

Hu Qiaomu's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LU Shu-yue¹, ZHANG Yi²

(1. Handan College,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2. Beijing Huaqing Feiyang Network Co., Ltd., Beijing 100600, China)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Hu Qiaomu had in-depth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on how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and realize the party's correct and scientific leadership of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He believes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in the new era can only be strengthened and not weakened;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is mainly the direction of its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politics, literary party spirit and literary tendenci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undertaking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literary and artistic undertaking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s well as in serving and guiding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ircles to make correct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Key Words: Hu Qiaomu in his later years;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thinking